

# 「人文精神」遮蔽了甚麼？

◎ 陶東風

自從1994年初，以上海學者為主在《讀書》雜誌（1994年，第3-7期）上發起的人文精神討論，至今依然受到關注與討論。目前文壇上的所謂「二王之爭」（王蒙與王彬彬）、現代人格精神、新理想主義、道德理想主義、新啟蒙等等熱門話題，都與人文精神的討論有話語間的「家族類似性」。在這篇文章中，我感興趣的是，「人文精神」這個話題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出場的？它的具體所指是甚麼？尤其是它遮蔽（借用尋思者們喜歡用的一個述語）了甚麼？

「人文精神」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批判的話語，表面上是針對由市場化引發的所謂道德淪喪、信仰危機、價值失落而出場的；但另一方面，它實質上反映了知識份子對自身的邊緣化處境的焦慮、不滿與抗爭。

—

人文精神的討論是80年代以來文化討論經一個時間的中斷以後的延續。然而，它所針對的問題與80年代大不相同。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並未出現「人文精神」這樣的問題意識、思維取向與言說方式，更沒有甚麼人文精神「失落」一說。人們意識到它的「失落」，是在90年代出現的（或者是從80年代末開始）。這一語境的

錨定啟示我們：對於人文精神作為一種話題的出場，與其只在思想史內部加以解釋，毋寧說它是知識份子對社會轉型的一種值得關注的回應方式。

從社會轉型的角度說，80年代的轉型基本上是觀念轉型（所謂「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關於主體性、人道主義的討論、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等等）；到90年代則進入了實踐的層次、物質的層次。80年代對於計劃體制及相關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否定，到了90年代落實為市場化的經濟文化發展方向，與世俗化的大眾生活價值取向。這種新的社會文化狀況又必然導致人文知識份子社會角色的轉變與社會地位的變化，也就是原來的啟蒙領袖、生活導師的地位的喪失，從中心被拋向了邊緣。世俗化的社會不需要啟蒙領袖與生活導師，尤其不需要那些慣於編織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主義、奉獻主義神話的人文知識份子來充當啟蒙領袖與生活導師，無論從官方到民間都是如此。蔡翔很準確地指出：80年代知識份子所倡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客觀上導致了知識份子本身在90年代的邊緣化，

以及他們原先的烏托邦式的想像與現實結果的錯位<sup>①</sup>。

正在此時，「人文精神」登台亮相，這種出場的語境決定了它有相當具體的現實針對性。一方面，尋找「人文精神」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批判的話語，表面上是針對（至少主要是針對）由市場化引發的所謂道德淪喪、信仰危機、價值失落（這種批判尤其集中在文化的市場化與部分作家的寫作活動的市場化）而出場的；但另一方面，它實質上反映了知識份子對自身的邊緣化處境的焦慮、不滿與抗爭。

## 二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知識份子在90年代所排斥的正是他們在80年代所呼喚的，比如從政治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文化的多元化，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爭取知識份子的自由與獨立的書寫權利，等等。其實，80年代知識份子所呼喚的，有許多仍然沒能成為現實，如政治的民主化、言論自由。但是今日倡導人文精神者似乎不是在這個意義上延續80年代的使命，而是把矛頭轉向所謂的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及文藝的市場化，轉向大眾的世俗生活取向。80年代的敵人似乎消失了，「左」的東西不見了，文化專制主義也不再是中國的現實，知識份子在市場的大潮中太自由，以致墮落了。於是，新的值得認真對付的就只是商業文化了。對市場化的認同與否成了區分真假知識份子的新標誌，成了知識份子陣營內部分化的一個分水嶺。

這是90年代出現的新動向。在80年代，判別真正知識份子的標準，

主要是看他對官方文化的態度：而今天，這個標準似乎被許多人拋棄了，代之以知識份子對世俗生活與商業文化的態度，似乎認同世俗生活與商業文化者就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這一點很值得關注。以王蒙為代表的知識份子與文壇二張及王彬彬們的分歧，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讀。我以為這是「人文精神」這一話題所遮蔽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中國的文化專制主義不但沒有消失，而且還時時在發揮着文化檢查官的作用。當然，文化專制主義（習稱「左傾路線」）在今天的運作機制確已大不同於以前。在話語運作的顯層次，文化專制主義作為官方話語已沒有多少市場，在鋪天蓋地的文化消費品中，「左」的聲音顯得那麼無力。但如果只看到這一層，那就會忽視它作為一種體制的實實在在的權力。

今日知識份子之所以轉移批判的對象，還有一個一直沒有被認真分析的原因，那就是80年代的知識份子對自己所呼喚的那套東西（政治、經濟、文化的選擇）並沒有實際的、感性的、切身的認識，因為那時這套東西還沒有成為現實。他們往往憑着主觀的想像來構想自己美妙的未來。可以肯定，知識份子在這個想像未來烏托邦中的處境與地位，一定不會是現在的這個樣子。當時他們只有政治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壓迫感，而今天隨着政治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在話語的領域走向隱層，或成為沒有對象的獨白，不再出現大批判、大論爭，他們的政治鬥爭情結（針對官方文化）被世俗文化批判的情結所取代。於是，「人文精神」的討論出場了。這大概也是這些尋思者如此一致地反覆強調人文精神是一種純之又純的、非實用

在80年代，判別真正知識份子的標準，主要是看他對官方文化的態度；而今天，似乎認同世俗生活與商業文化者就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王蒙與文壇二張及王彬彬們的分歧，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讀。

的、超越的、既擺脫了政治實用主義、又擺脫了經濟實用主義的價值理性、終極關懷的原因。

這種終極訴求所遮蔽的問題是：他們所認為的思想解放所導致的不如人意的結果(粗鄙化)，到底是指社會文化的世俗取向本身，還是指世俗化過程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中所顯示的特殊性？就目前見到的文字來看，那些倡導「人文精神」的知識份子更多地是在排斥世俗本身，而不是對世俗化在中國的實情作深入的、尤其是體制的分析。這就迴避了問題的實質，或者說用一些抽象的、大而無當的哲學批判代替了具體切實的社會批判。

從超越國家的普遍意義上說，世俗化是現代化這個題中應有之義，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經歷世俗化，而世俗化就是要從神權社會走向市民社會、世俗社會，肯定大眾的世俗價值取向，商業文化只是這個取向在文化上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今日中國的市場化、世俗化、商業化的趨勢是有其充分的正面功能的。除非你對現代化本身也加

那些倡導「人文精神」的知識份子更多地是在排斥世俗本身，而不是對世俗化在中國的實情作深入的、尤其是體制的分析。他們用一些抽象的、大而無當的哲學批判代替了具體切實的社會批判。



以拒斥，否則，要談論人文精神，就必須是在肯定世俗化的前提下進行。至於市場化、世俗化的過程的頗具中國特色的負面性，我以為正好是因為中國社會還保留了太多前現代的、政治社會的特點，尤其是舊體制的權力結構依然在極大地阻礙着新體制的建構，使得市場活動與世俗生活的正常規範難以建立。離開了這一點，談甚麼道德的滑坡、人文精神的失落都無法抓住要害，只是流於空談，甚至給人以道德信念、人文精神失落於市場經濟的錯覺。有些人甚至乾脆直言不諱地拒斥世俗化、市場、市場經濟，說甚麼重建人文精神就要回到「天國」，用「源自天國的東西」，來「否定和批判塵世的東西」<sup>②</sup>。從西方的歷史看，人文精神本來正是從天國走出來的，用塵世的生活來抵抗神權與神性，它是社會世俗化過程的產物，也是與政教分離的社會重構相適應的；而在我們這裏，尋找人文精神恰好是要回到「天國」，以神性來抵抗人性，以宗教來滅絕世俗，以終極關懷來否定日常生活：又由於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的宗教，只有政治倫理哲學以及建立其上的倫理本位的政治社會，那麼，我們是要回到這種並不陌生的政治社會中去麼？

### 三

我並不是說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完全照搬西方，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社會的現代化恐怕都得考慮政治選擇、經濟選擇與文化價值選擇的兼容性的問題，這三種選擇不是孤立的。比如計劃的經濟模式必然伴隨專制的政治制度與一元的政治文化，否則就無法

運行：而市場化的經濟選擇也必然要有民主的政治制度與自由多元的文化價值的支撐，否則市場就不成其為真正的市場；而現在許多談論人文精神、呼喚道德理想的知識份子，至少在主觀上是認同經濟上的市場化與政治上的民主化的（當然也有個別連這兩者也不認同，但畢竟是極少數），但不願接受文化上的多元化、自由化，這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於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商業文化採取激烈的排斥態度，認為它們不夠「元」的資格，是人文精神的大敵。甚至可以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有些人還自覺不自覺地留戀一元主義或「有條件的」多元主義，還是要當文化的審判官。

問題是：一、這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空想，「有條件」就不是真正的多元；二、誰也沒有資格說自己能夠準確地判斷那一元是合格的、那一元是不合格的，因為人人都有可能錯判，為了避免犯錯誤，我們最好不要隨便取消一種觀念、言論、藝術風格、審美趣味、文化價值取向的「元」籍，當然這不等於取消正當批評的權力，而只是限制對文化審判權的濫用；三、文化的審判權在某時某地排除的可能確實是一個不夠格的、糟糕的「元」，但是由於它總是也只能是操在具體的可能犯錯誤的人手中，所以它完全可能在另外的時間和地點扼殺掉不但夠格、而且是偉大的真理（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四、文化上的一元主義，或對文化審判權的保留，完全違反了市場經濟所內在地具有的政治與文化的精神。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有些極端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不但取消文化上的多元主義，而且進而否定政治上的民主與經濟上的市場化），由於堅持了

對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的全面否定，在邏輯上倒是比較一貫的；至於那種只要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而堅持文化一元化（這種一元化以清理文化垃圾的道德面目出現）的選擇，因為看起來十分完美，所以很容易得到認同；但正如剛才所說，它在理論上是矛盾的，在現實上是行不通的。

#### 四

我當然不是說世俗化或者現代化是絕對不可以批評以至批判的。但是這裏要強調的是，這種批判可以有同質與異質兩種標準。同質的標準，也就是世俗社會本身的、屬於工具理性的標準，這裏有相當多的文章可作，比如中國是不是真正世俗化、商業化了？如果沒有，中國的市民社會、世俗社會規範為甚麼難以建立？舊體制、舊觀念在其中起着甚麼樣的作用？這種追問將比抽象地高喊「道德理想」、「終極關懷」（一種抽象的哲學批判）要更能切中問題的根本。後者的批判所依賴的預設與前提是：中國社會已經充分地商業化、世俗化了，因而它的問題（如道德墜落）全然是由商業化與世俗化帶來的。然而，恰好是這個前提本身是值得質疑的。

對世俗化與現代化的批判也可以用異質的標準，即價值理性的標準。這種批判也是十分需要的。西方現代化的實踐表明，在現代化的啟動時期，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是並存的、相互制約的，而後來則走向了工具理性的膨脹與價值理性的萎縮。但是，這種來自異質標準的批判必須要有邊界意識。我的基本看法是：

現在許多談論人文精神的知識份子仍不願接受文化上的多元化、自由化，他們還是自覺不自覺地留戀「有條件的」多元主義，要當文化的審判官。而堅持文化一元化（這種一元化以清理文化垃圾的道德面目出現），在理論上是矛盾的，在現實上是行不通的。

(1) 終極關懷、宗教精神之類非世俗性的、超越的價值理性應該是一種文化批判理論，而不應是一種社會建構理論。在它與工具理性之間應當有有效的距離限定，以防它直接落實在工具理性層，成為社會建構的實踐。作為處於邊緣的文化批判的聲音，它可以與處於主流的世俗社會取向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和張力結構。否則，以宗教性的道德理想或價值理性來取代、否定、掃蕩世俗性的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必得導致全盤拒斥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同時也與世界歷史的潮流背道而馳。

(2) 克服當前文化價值建構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終極關懷與世俗取向之間的緊張，關鍵在於處理好多元與中心、相對與絕對、世俗與神聖、物質與精神、整合與開放等不同訴求之間的關係，這將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價值建構的一個核心課題，同時也是一個相當棘手的難題。我以為這需要在兩種訴求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與制約關係，也就是世俗價值論者與人文精神論者的握手言和。為了防止相對主義與多元取向的極端化，我們應當有一些基本穩定的、具有普遍效度的文化規範。但我更傾向於把它稱為人類行為的基本倫理準則而不是甚麼終極目標，我以為終極的東西是屬於個人的，是個體性而不是普遍性的，它存在於個體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是不可也不必推廣或與他人共享的。它的作用不在於把全人類的精神世界統於一，而是在於為個體的靈魂提供一個家園。每個人的家園都可以不同，不必強求一律也不可強求一律，否則就是對個體自由的侵犯、是是是忍孰不可忍的行為。但同時，人的行為又必須受到基本的價

值規範與倫理法則的制約，這種價值規範與倫理法則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推廣的、是不可以用文化的或價值的相對主義為藉口加以拒絕的，是連解構主義都不能不加以保留的。這是一種最低限度的人類共識，它完全可以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平等對話而達成。我想，對於這樣一種最低限度的共識與原則，無論是多元論者還是中心論者、是世俗主義者還是超驗主義者、是現實主義者還是理想主義者、是留戀日常生活者還是追求崇高偉大者、是小寫的人還是大寫的人，都應當接受且可以接受的。

中國的情況與西方不同，在西方，經過幾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世俗的文化取向與價值規範早已經制度化，成為中心與主流，而來自價值理性的批判(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處於邊緣。中國的情況則十分不同，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儘管可以追溯到近代，但一直被不斷地中斷，至今現代性、世俗性的文化價值取向依然未能全面地制度化，也沒有成為絕對的主流與中心，甚至可以說在很多方面依然處於邊緣。在這種情況下，非世俗化的取向就很可能得到舊制度與舊文化心理的支撐，成為否定現代化的力量。

在中國，現代性、世俗性的文化價值取向依然未能全面地制度化，也沒有成為絕對的主流與中心。在這種情況下，非世俗化的取向就很可能得到舊制度與舊文化心理的支撐，成為否定現代化的力量。

### 註釋

① 《讀書》，1994年，第5期。

② 王彬彬語，見〈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第7期。

陶東風 文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